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黄炎培



尚丁 著



 群言出版社
Qinyan Press

黄炎培
HUANG YAN PEI

尚
丁
著



群言出版社
Qianya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炎培/尚丁著. —北京:群言出版社,2012. 10

(民盟历史文献)


ISBN 978 - 7 - 80256 - 374 - 2

I. ①黄… II. ①尚… III. ①黄炎培(1878 ~ 1965)

—人物研究 IV. ①K827 =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22239 号

出版人 范 芳
责任编辑 盛利君
装帧设计 群言艺术设计中心
出版发行 群言出版社(Qunyan Press)
地 址 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 1 号
邮政编码 100006
网 站 www.qypublish.com
电子信箱 qunyanCBS@126.com
总 编 办 010 - 65265404 65138815
编 辑 部 010 - 65276609 65262436
发 行 部 010 - 65263345 652202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读者服务 010 - 65220236 65265404 65263345
法律顾问 中济律师事务所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mm 1/32
印 张 9.5
字 数 195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56 - 374 - 2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前 言

中国民主同盟成立于1941年3月，正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遭到国民党独裁统治破坏的危难之际。民盟以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尊重思想自由、提倡依法治国为政治纲领。民盟凝聚了当时绝大多数进步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可谓群贤毕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黄炎培、张澜、沈钧儒、杨明轩、闻一多、李公朴、梁漱溟、史良、胡愈之、楚图南、吴晗、费孝通……这些民盟前辈精英们纵横捭阖、开阔放达，本着知识分子的人文良知和社会责任“奔走国是”，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社会等领域都提出了明确的纲领和主张，将平等、民主、自由的思想播撒在中国的土地上。

在那苍黄翻覆、陵谷变迁的大时代，在那风云变幻、波澜壮阔的动荡岁月里，历史的浪潮将中国民主同盟，将有志于民族振兴的贤良才俊推上了风口浪尖，他们在改变中国命运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他们为历史的进程，为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民主政治的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将自己的荣辱与民族存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为中国的民主、繁荣奋斗了一生，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探索，至今仍具有巨大的影响和现实意义。

在和平盛世的今天，为了保存这珍贵的历史财富，为了让后人记住先辈们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及他们为国为民、励精图治的奋斗事迹，我们通过多年的精心准备和积累，出版了《民盟历史文献》丛书，这不仅仅是追忆往昔、缅怀先贤，也不仅仅是为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去厘清历史、臧否人物，更重要的是：通过回顾那段曲折的历史，传承民盟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真挚感情；纪念民盟先贤为新中国做出的巨大贡献；呈现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嬗变和进步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同时也是为了民盟薪火相传、与时俱进的需要；为了让那些隽永传奇的人物和可歌可泣的历史再现后人的眼前。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民盟历史文献》丛书的出版，是对先贤们多党合作历史的尊崇和传承。

《民盟历史文献》编委会

序

黄炎培的爱国主义道路

黄炎培是我国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杰出教育家、政治家和诗人。他的一生，贯穿着一条红线，那就是爱国主义的红线。这条红线，贯穿着他的事业、政治活动、诗歌，乃至他整个人生。

“爱国主义，是人们热爱祖国的崇高思想和忠于祖国的坚贞信念，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深厚的感情。”（列宁）中国，地处亚洲大陆东方，东、南面临大洋，西、北屏障高山、草原，土地辽阔，物产丰饶。在长久的农牧社会时代，中华各族人民群众在这个领域里繁衍、生息、交流，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得人民对自己祖国的大好河山，生发出无比的热爱。爱国主义，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从春秋以至明、清时代，爱国主义表现为华夷之辨，亦称“华夏之辨”。这个华夷之辨的观念，始于孔子。《左传》定公十年记载有孔子关于“夷不乱华”的话。孔

子盛赞管仲反击北狄侵邢、侵卫的活动,认为管仲有保卫华夏文化的巨大功劳。后来,保卫民族主权的斗争,就赋有爱国主义的意义。热爱祖国的崇高思想和忠于祖国的坚贞信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

当然,爱国主义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是由一定的经济条件产生的观念形态,是一种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内容的历史现象。“华夷之辨”的爱国主义观念,就是以儒家的君权思想为核心的陈旧的传统观念。这种“华夷之辨观念”,把中国自封为世界的中心,自以为至高无上、唯我独尊,而把外邦目之为劣等的“蛮夷”,都应当对天朝皇权顶礼膜拜,臣服进贡。这种“华夷观念”还把“忠君”和爱国掺合在一起。这正是传统的爱国主义思想中的糟粕。但这种观念,却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等,虽然接触到了西方文化,而他们对外部世界的视野有限,所以,还坚持中国传统的“华夷观念”的合理性,主张采用西方的船坚炮利,目的在“以夷制夷”。他们的爱国动机是良好的,爱国的激情也是值得称道的,但由于还没有摆脱“华夷观念”,所以,不免是时代的悲剧式人物。

鸦片战争的冲击,以及鸦片战争以后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打破了天朝皇权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的神话,深刻地刺激了中国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传统文化表现出离异的倾向,开始认识世界大势,潜心研究外情,切望从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教育体制和科技文化中,寻找致富致强的源流,为

中国的变革提供良好的参照系。

黄炎培和他同一代的爱国知识分子，正是中国近代较早跨越中世纪门槛的新一代爱国主义者。他们是更富理性、更深沉的爱国主义者。

黄炎培，1878年出生于东海之滨的今上海市浦东新区。他出生前38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清帝国的大门。根据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上海于1843年开埠，辟设了租界，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桥头堡。帝国主义侵略、欺凌的种种罪恶，早就深深地触动了黄炎培幼小的心灵。随着岁月增长，他目睹祖国山河破碎、国势凌夷、朝政腐败、民生凋敝、列强环伺、丧权辱国的条约一个接一个签订，瓜分之祸迫在眉睫。他痛感国家危亡、民族耻辱无时或释。甲午战争更给予17岁的黄炎培以巨大的刺激，使他爱国之心勃然而起。对国家民族的荣辱兴亡，促使他从古今中外的学说中去探求强国兴邦之道。18岁那年，他在姑父沈肖韵的藏书读到第一本新文化的书，就是赫胥黎著、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读了《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使他知道，不论个人、集体、社会乃至国家民族，都要努力奋斗，自强不息。

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沿海港湾，深入内地，掠夺我矿产资源和权益，并积极谋划瓜分中国。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情况下，爆发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1900年，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口号，打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烧教堂，打洋

兵，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斗争。6月，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攻陷北京。清政府在帝国主义逼迫下，再一次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这时候，黄炎培没有在科举仕官之路上走下去，而是考入了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的前身。在南洋公学特科，黄炎培受到中文总教习、杰出的爱国主义教育家蔡元培的很大影响。当时，我国的爱国志士，都在认真思索中国“积弱”的深层原因，谋求强国富民的良方。有主张“变法”者，有倡导“变学”者。蔡元培认为：“在竞争激烈的20世纪，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上立住脚，只有以教育、学术为基础，废科举、办学堂、开民智，唤醒民众，以挽救危亡。”在南洋公学时期，黄炎培开始形成“教育救国”的思想。

1902年冬，南洋公学发生一场大风波，专横霸道的总办汪风藻竟解散了南洋公学。黄炎培离开南洋公学后，即投身于办学活动，创办了川沙小学堂，并在浦东的一些小城镇，举办公开的演讲会，宣讲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如何凶狠，揭露它们正在阴谋瓜分中国，国家的前途何等危险，清政府多么腐败和屈膝媚外，大声疾呼以唤起民众。黄炎培的这些爱国活动，招致了清政府的迫害，拘捕了他，几乎被“就地正法”。他不得不逃亡到日本。那时候日本的明治维新正大见成效，使黄炎培开了眼界。作为中国同盟会会员，黄炎培曾积极投入辛亥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失败后，黄炎培辞去江苏省政府教育司司长职务，深入社会，足迹遍及东南各省穷乡僻壤，进行调查研究。又几度远涉重洋，赴美国、日本和菲

律宾等地,作实地考察,以寻求强国富民良方。黄炎培说:“吾辈业教育,教育此国民,譬之治病,外国考察,读方书也;国内考察,寻病源也。方书诚不可不读,而病所由来其现象不一,执古方治今病,执彼方治此病,病曷能已。”黄炎培经过对西方各派教育学说的披读研究,和在国内外进行了深入的调查考察,认为“今吾中国至重要、至困难问题,厥惟生计;曰求根本上的解决生计问题,厥惟教育。”他主张:“智育,授以生活上所必需之普通知识技能,强调一切教育须具有实用价值;德育,宣归于实践;体育,求便于运用。”由此,他萌发和孕育了中国职业教育的理论体系。于是,他大声疾呼:“提倡爱国主义根本在职业教育。”

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是从实用主义教育脱胎而来的。他也并不讳言是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接受了杜威的“教育即传递、即生活、即发展”的论点。但黄炎培的职业教育立足于中国本土,以爱国主义的思想基础,针对中国社会实际,目的在于解决中国的国计民生,救中华民族于危亡,求中国之国富民强。所以,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绝不是简单地模仿外国模式,而是本着中国国情,自尊自立,勇于吸收,择善而用,经过改造和消化,熔“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于一炉,具有中国特色。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产生了“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思想,是一个爱国主义的思想。它要求实业家、教育家投身到救中国的事业中去,是有民族责任感的爱国思

想。过去,在“左”的路线下,“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思想曾经遭到长时期的批判。现在回过头来看,应该指出,那些批判是不公正的,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首先,应该肯定,它是有民族责任感的爱国思想。第二,它也是一个进步的思想。救中国靠什么?他们解脱了封建桎梏,宣言不靠旧礼教,不靠古文明,而是找新的工具和生产力。西方的一些先进的思潮和生产力给予他们以启迪,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是一个进步的思想。当然,“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是一种有局限性的思想。在旧社会,探求救国之道,只看到“教育”的作用、“实业”的作用,而不懂得不改变那个社会前提,“教育”、“实业”是无从发挥“救国”作用的,也就是不懂得以革命方式改造社会才是真正的救国之道。但应该看到,基于爱国主义的“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思想,是一种过渡到革命立场的思想。那些爱国的教育家和实业家,由于世界观的局限性,虽然没有自觉地把自己的工作组织到革命斗争中去,却也没有企图用“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口号去抵制、代替革命道路的主张。他们在旧中国困难的条件下,为发展教育,发展实业,付出了毕生的辛勤劳动,培育了大量有为的人才,为取得革命胜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新中国的建设作了准备,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是有贡献的。

黄炎培倡导职业教育,于1917年发起创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了中华职业学校和《教育与职业》杂志。他明白宣告:“职教社的唯一信仰,就是爱国、报国。”“一切一切

靠的是中华；一切一切为的是中华。”经过10年的推广和实践，职业教育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了。但是，事与愿违，在那样的社会，职业教育是救不了国的。黄炎培在总结职业教育开创10年时感慨地说：“我们也算‘尽心力而为之’了，可是，我们所希望的百分之七八十没有达到。”原因是国难日益深重，“专守教育岗位，不足以救国。”他说：“要明白摆在面前的大问题，就是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很明显地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生存，一条是死亡。过去我们只要个人努力就可以生存，今后要大家一起努力，集中大家的力量，才能抵抗敌人的压迫，取得生存。”于是，黄炎培提出了“大职业教育主义”，郑重宣告：“本社以后应加入政治活动，以增实力；并与职业社会作实际之联络，以期合作。”从而进一步赋予了职业教育以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

这说明，黄炎培倡导的职业教育，以爱国主义为依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僵化模式，而是适应国家民族的要求，与时俱进的。

按照“大职业教育主义”，黄炎培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着手组织了“农村教育研究会”，在昆山、镇江、上海漕河泾等地开办了农村改进实验区，并创办了评时论政的杂志《生活》周刊，还与各地实力人物往来联络，宣传救亡图存。但 these 活动，遭到反动统治者的嫉恨和迫害，黄炎培一再被迫流亡海外。在朝鲜和日本，黄炎培耳闻目睹日本帝国主义者明目张胆地进行侵华备战，日寇亡我之心昭然若揭。黄炎培到

处奔走呼号。但他的警告根本不被耽于“剿共”的国民党政府当局所重视。终于,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在我东北发动了侵华战争,攻占我沈阳、营口、长春、安东等地,这使赤诚的爱国者黄炎培痛不欲生。

上文指出:基于爱国主义的“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思想,是一种能够过渡到革命立场的思想。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可能经过各种迂回曲折的过程,总是步步前进的。黄炎培的经历就证明了这一点。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政府奉行“不抵抗”的卖国政策,东北沦亡了,中华民族危在旦夕。怀有赤热爱国心的黄炎培,再也无法囿守于“教育救国”的旧轨道,从而全身心地投入抗日救亡的大潮之中。黄炎培多次说过:“1931年是我思想和行为急剧地转变的一年。兄弟看到国家民族危机的紧迫,就以为仅服务社会,办理教育,所发挥的力量还不够,所以,将主要事业交付朋友,自己进一步的参加抗日救亡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黄炎培立即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他和上海市具有爱国反帝热忱的文化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35人,组织了“抗日救国研究会”,以宁波同乡会为机关,天天聚会讨论抗日大计。同时,黄炎培和职教社同仁又创办了《救国通讯》杂志(后简称《国讯》,出版达17年之久,于1948年被国民党政府查封),以鼓吹抗日救国斗争。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又在上海发动战争,十九路军在全

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影下，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奋起抗战。黄炎培和他的挚友史量才，团结了上海市各界上层代表人物，发起组织“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后改组为“上海地方协会”，史量才任会长，黄炎培为秘书长。）声势浩大地发动各界征募军需品以支持十九路军抗日战士，并维持地方秩序和市面金融。黄炎培还和职教社同仁以及所属各学校师生，冒着枪林弹雨，运送军火物资，抢救伤员，收容救济难民等。

“一·二八”淞沪之战以后，黄炎培深知日本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所以，他坚持抗日救亡的活动毫不松懈。为了宣传动员抗日，他两次入川，并代表上海人民前往百灵庙慰劳抗日的傅作义部队。还在供应抗日前方军需、战区救护和救济、推动民族工业内迁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这时，沈钧儒、邹韬奋等救国会的7位领导人，因从事抗日救亡运动而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即震动全国的“七君子”案。黄炎培即亲赴苏州监狱探望和支持。

“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黄炎培，更奋不顾身，全身心地投入了抗战大业。第二次国共合作，各党各派初步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全民抗战，共赴国难。黄炎培对于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局面，是满心喜悦和热烈拥护的。因此，他接受了国民党政府聘任为国防参议员和国民参政员。在抗战烽火中，黄炎培仆仆风尘，积极参加各种抗战活动，还几次亲自到南洋各地劝募抗战公债。他在日记上写道：“余任参政员，自己认定两大任务：一、助成

政府与民众合作；二、助成各党派间合作。”又说：“只要有利于抗战，有利于国共团结，我都卖力去做；而对妥协投降，我都坚决反对。”在团结抗战中，他与中共领袖周恩来、董必武等，建立了真挚的战斗友谊。他深深知道，只有国共团结合作，才能完成抗战大业，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所以，为了抗战前途，黄炎培到处苦口婆心讲团结抗战，并在各种场合做了许多居中调停、宁人息事的调和周旋活动，以后被人讥为“和事佬”。但他忍辱负重，不加计较。但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妥协投降活动却愈来愈猖獗，汪精卫叛国投敌，组织伪政府；蒋介石则一次又一次地接连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破坏团结抗战的局面。这从反面教育了黄炎培，知道只在上层人物中苦口婆心地做些调停周旋工作，感动不了反动派，也无从坚持抗战到底。

由黄炎培团结起来的一批有志于“教育救国”的文教界和工商界人士，在爱国主义的大道上，从单纯的职业教育救国，走到“大职业教育主义”，而步入政治舞台，奔走国事，参与政治斗争，形成一股政治力量，世称“职教派”。而黄炎培在国民参政会中则是公认的“职教派”领袖。

1939年，当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时，忧心如焚的黄炎培，与其他三党三派领袖组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配合中国共产党，为团结抗战奔走出力。黄炎培是这个组织的核心人物。1941年，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了“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政策指引下，三党三派的领导人，奋起组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三党三派 13 位领导人出席了秘密举行的成立大会。黄炎培、江向渔、冷遹三人出席了成立会，并当选为“同盟”的中央执行委员，黄炎培被推为“同盟”的第一任中央主席。民盟支持中国共产党抗击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并在斗争中进一步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推动民主运动，坚持抗战大业。

但是，对黄炎培来说，一个真正的重大转折，是他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邀请访问延安。在短短 5 天的访问中，黄炎培在延安的所见所闻，特别是与毛泽东十几个小时的促膝长谈，大大澄清了他许多模糊思想，打开了他的眼界，使他真正看到了祖国光明灿烂的前景，鼓舞了他努力追求真理的勇气，从而向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党的支持和帮助下，黄炎培团结了我国民族工商界和文化教育界人士，筹组了我国又一个重要政党——中国民主建国会。他带领了民建会会员和它所联系的民族工商业家与广大群众，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内战，积极支持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解放后，黄炎培以党派领袖的身份，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多党合作制度，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积极投身于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他在 80 年的回顾中说：“终于能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走向新生。今后，将一心一意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

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

黄炎培的心路历程,证明了一条真理:真正爱国的教育思想和科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是相通的。黄炎培和他那一代抱有“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等等爱国主义思想的人,经过战斗的考验,经过中国共产党及其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和帮助,都大批地,逐步地走上了革命道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历史的进程是曲折的。黄炎培所经历的道路如此,黄炎培所倡导的职业教育也复如此。在新中国成立后,职业教育也曾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认为职业教育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产物,中华职业教育社走的是反动的改良主义的道路。职业教育姓“社”(社会主义)还是姓“资”(资本主义)?职业教育姓“资”的观点,在“左”的错误指导思想占支配地位的岁月里,更是风靡一时,于是,“职业教育”的名称被歧视,职业教育在中国被冷落了30年。那么,职业教育究竟姓“社”还是姓“资”呢?1991年10月17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已经作出历史的结论。它说:“九十年代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非常关键的十年。进一步发展教育事业,推动科技进步是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并为下世纪经济和社会发展奠定基础的迫切需要。职业技术教育的规模 and 水平影响着产品质量、经济效益和发展速度。”

爱国主义,既是一种理性的抉择,也是一种崇高的情感。